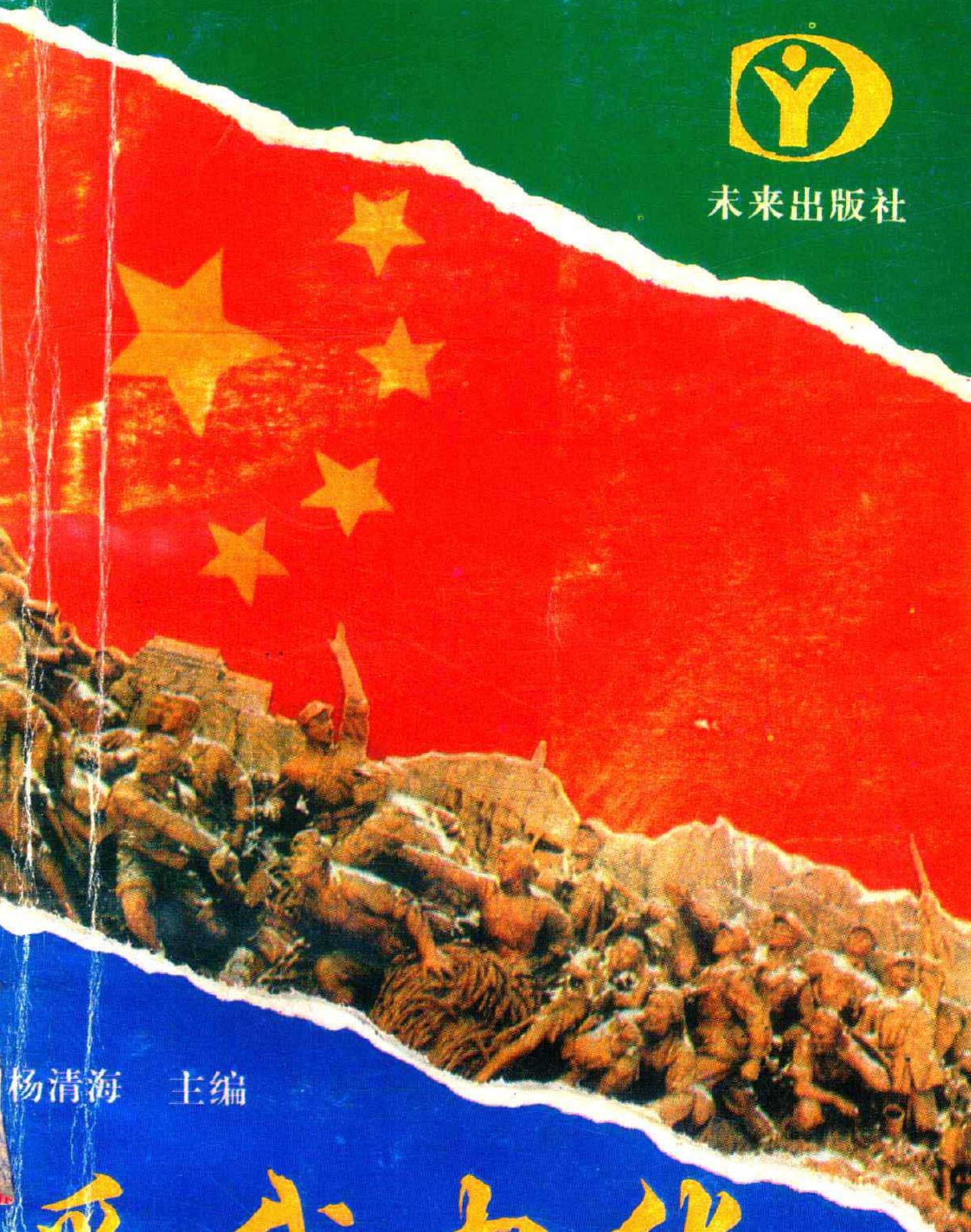


青少年德育文库



未来出版社



杨清海 主编

爱我中华

——著名学者爱国故事

青少年德育文库

爱我中华

——著名学者爱国故事

杨清海 主编

未来出版社

《青少年德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何其昌

副主任 朱玉 赵喜民 杨启伦 李天增

委员 (按姓氏笔画)

朱玉 李天增 杨启伦 陈四长

何其昌 赵喜民 袁明仁 曹彦

(陕) 新登字 005 号

青年德育文库

爱我中华——著名学者爱国故事

杨清海 主编

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1 字数 125 000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7—5417—1004—O/I · 234 定价：6.20 元

目 录

| | |
|---------------|--------|
| 第一颗中华星 | (1) |
| 能抵十万军的一枝笔 | (9) |
| 画不卖与官家 | (14) |
| 不为奴隶而生 | (17) |
| 一刻值千金 挥戈扫顽敌 | (21) |
| 学界泰斗的强国之路 | (26) |
| 正义之神 | (31) |
| 一掷千金保护国家珍宝 | (37) |
| 流亡中的战士 | (43) |
| 智慧女神 | (47) |
| 一枝笔抒尽爱国情 | (52) |
| 开拓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先驱 | (57) |
| 漫长的科学历程 | (61) |
| 为祖国的荣誉而奋斗的科学家 | (66) |
| 在人生的转折点上 | (69) |
| 一个历史学家的爱 | (74) |
| 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 (78) |

| | |
|-----------------|-------|
| 杰出的爱国学者徐寿 | (81) |
| 一生不仕的教育家 | (85) |
| 立志富强救国的思想家 | (89) |
| 一位民主教授的爱国心 | (96) |
| 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不辞劳苦的人 | (103) |
|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 (108) |
| 追求爱国民主进步 | (113) |
| 东西方文化联姻的红娘 | (116) |
| 一代报人永生的模范 | (121) |
| 经济学家的慧眼 | (125) |
| 赤心为国的气象学家 | (129) |
| 宁死拒食侵略者的“救援面粉” | (132) |
| 一代宗师的晚节 | (135) |
| 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 | (141) |
| 为中国铁路光荣史写第一笔的人 | (146) |
| 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 (152) |
| 一片冰心在玉壶 | (162) |
| 魏源与《海国图志》 | (167) |
| 爱国教育家马相伯 | (173) |
| 通西学的第一人 | (177) |
| 爱国老人缪云台先生 | (184) |
| 西学东渐求富强 | (188) |
| 为了祖国 | (193) |

| | |
|----------------|-------|
| 诗坛领袖 爱国赤子 | (196) |
| 共和国的杰出科学家 | (201) |
| 书生亦欲请长缨 | (214) |
| 著名出版家张元济 | (218) |
| 会通中西的数学家 | (223) |
| 爱国教育家刘湛恩 | (229) |
| 为祖国的荣誉画马的人 | (233) |
| 第一幅中国近代化蓝图的设计者 | (236) |
| 国可破史不可灭 | (242) |

第一颗中华星

1986年7月21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我国天文学界的一颗“星”陨落了。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中华”号行星的发现者、紫金山天文台的建造者之一——张钰哲。

1902年，张钰哲出生在福建闽候县城的一个职员家庭。2岁丧父，从小和母亲清贫度日，相依为命。后来靠着申请免费才上了学。由于家境贫困，生活艰难，所以他学习非常刻苦。在中、小学毕业时，成绩均名列全校第一。1919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

在清华园，张钰哲除了知识面的增长，思想也日渐成熟。他了解到天文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授时历”、“地动仪”等都在世界上领先一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军阀的摧残，我国的天文学日就消亡，远远落后。这是炎黄子孙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从此，他放弃了所学机械工程专业，毅然报考了芝加哥大学天文系。

1928年，26岁的张钰哲正在美国叶凯士天文台实习。就在这一年的11月28日夜，他用口径60厘米的反射天文望远镜发现了一颗行星，这个行星他已追踪了两年多时间，他紧盯不放，经过几个月的连续观测与推算，终于确定了这是一颗从未有过记录的新的行星。“国际行星中心”也很快承认了这一发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颗由中国人发现的行星。国际上有惯例，发现人有权为自己发现的行星起名。张钰哲身处异国他乡，心却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养育他的祖国。于是，他将这颗行星定名为“中华”号。

中华星的发现和定名，为当时极其落后的中国天文研究事业争得了莫大的荣誉，张钰哲这个名字也很快被国人所知晓。

1929年夏天，张钰哲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就在刚获得学位的那一天，叶凯士天文台台长樊比博教授挽留他在该台任职，张钰哲婉言谢绝。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写道：“楚材岂能为晋用，相期神州建灵台！”不久，他便毅然返回祖国。

张钰哲回国之时正值紫金山天文台创建之初，他立即忘我地投身于筹建工作中。

1932年9月10日，天文所所长余青松派张钰哲去北平，要他用最短的时间把放在古观象台的4

架古天文仪器抢运到南京来。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更加猖狂地向我国西部进犯，华北危急，京津告急。战局急转直下，张钰哲丝毫没有退缩。他非常镇定地对余青松说：“好，我马上就走。”余青松情不自禁地抓住张钰哲的手，表情严肃地说：“这4架古天文仪器是中国的传世国宝。它们不仅是精密度很高的古天文望远镜，而且还是世界上罕见的古雕铸珍品。因此，这次一定要把它们全部运回来，千万不可落到敌人手里！”

听了余青松的一番话，张钰哲深感任务的艰巨，但同时心中涌起了一种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振奋感。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又语气严肃地对余青松说：“万一我要是回不来，切盼此台能早日建成！救亡图生存，最重要的是充实学术力量。国家虽然现在动荡不定，但是只要我们人心不死，将来就会有希望！”说完后，他和余青松握手告别，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踏上了去北平的道路。

到北平后，张钰哲立即将天象仪、圭表装在箱子里运往火车站。可浑天仪、简仪这两座庞大的仪器却无法运送。余青松曾对他说过，古代的东西也可以拆卸开来。可他用放大镜将这两座古仪细细观察了好多遍，没有找出一点可拆卸的地方。经查找资料后，他才知道这两座古仪早在公元118年就由

张衡设计成了一个整体。他又计算了一下它们的重量，分别达 8 吨和 7 吨。这时，他才明白了当年八国联军虽对它们垂涎三尺，却最终没有把它们运走的原因了。

张钰哲几乎跑遍了北平城，结果还是未找到能载得起这两座古仪的大卡车。因为那时中国的卡车绝大多数是载重 2.5 吨的进口车。正当张钰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古观象台时，两座古仪器旁边站了几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他急忙跑过去。一个军官用强硬的口气对他说：“昨日承德沦陷，所以上级命令：一旦北平危急，立即炸毁这两座古物，不得有误！”

听到这些话，张钰哲心如刀割，他紧紧抓住浑天仪喊道：“不，再等等，再等等！”当然，他明白这两座国宝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忽然，张钰哲急中生智，记起古观象台的历史资料中曾提到，浑天仪是光绪年间，由钦天监紫微殿移置到这里的。那么，当年人们是怎样将这座庞然大物移动了 6 公里的呢？经过打听，张钰哲得知当年移动浑天仪时，正值数九寒天，百姓就在地上泼水，铸成了冰道，然后由百余壮汉推到晷影堂前的。张钰哲从此受到了启发，决定用人力来运送这两座古仪。但是，当时恰是九月，不可能有冰道，聪明的张钰哲想出了

一个办法：用圆木垫在古仪下面，然后推移。就这样，数十名连夜招来的工人，在张钰哲的指挥下硬是将古仪一点一点地移到了火车站，最后安全地运送到了南京。他这种顽强的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赢得了人们无限的敬佩。

1937年1月，张钰哲被任命为紫金山天文台台长。正当张钰哲在事业上蒸蒸日上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不久，日军对上海进行包围，南京城里一片慌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下令各部院快速向内地迁移。但张钰哲为了多观察一日，多一份记录，坚决请求留守。8月5日，日本飞机不时狂轰烂炸，南京城内各机关已撤退一空。而张钰哲这时却测得了一项重要的太阳活动预报：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带从新疆进入我国。经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最后从福建入海。8月27日，南京又遭空袭，一颗炸弹正好落到张钰哲办公的庭院中，张钰哲腿部受伤。10月底，他伤好后又重上紫金山进行观测。但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南京危在旦夕。12月5日，张钰哲迫不得已走出了他在紫金山的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在去武汉的船上，张钰哲向船上的伤兵、难民和自己的职员发表演说：“……我们的军队退出了上海，闸北的防线放弃了，但我们精神

的防线永远不能放弃！民族抗战的前途就在我们成千上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心上！”这段慷慨的演说使船上的人们无一不振奋。

以后的三年里，张钰哲一直没有停止过观测工作。

经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证实：张钰哲测报的1941年9月21日将在中国出现的日全食，为全球400年来一次罕见的日食现象。消息很快传开了，引起了天文界的极大重视。1940年1月，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成立。他们积极筹款，购买仪器查找资料……到了1941年初，日食带要覆盖的地区大部分沦于敌人手中，其它国家的观测队也因中国内战而取消了来华观测的计划。这样，本次日食观测及留下记录的责任就全部落在了中国天文工作者身上。同年4月，中国日食观测队成立，共10人，张钰哲任队长。6月，全体队员到昆明集训，购买的地平镜也运到了香港。不幸的是，太平洋战争又爆发了，这架价值3万美元的观测日食的主要仪器，在准备往重庆接运之时在香港码头被日机炸毁。在这种情况下，张钰哲将带到昆明的6寸口径摄影望远镜头取出，配上木架，外面蒙上黑布当做镜筒，又向有关地方借了一些必备的观测仪器。

观测地点定在甘肃的临洮县。

1941年6月29日，张钰哲率领中国日食观测队，携带仪器设备，乘坐一辆大卡车从昆明向3000公里外的临洮出发。当他们行至贵阳时，遇到了日机空袭，他们还算幸运，躲了过去。几天后，在重庆郊外，又遇上日机的轰炸，他们在一块农田里趴下，炸弹爆炸，硝烟弥漫。日机走后，张钰哲和队员赶忙跑回公路，只见一片狼藉，所幸的是，观测队的车辆，没有损伤。

当时，重庆是日机空袭最频繁的地方，为防止意外，他们躲在郊外歌乐山中，等待甘肃油矿局来接的车辆。7月20日，他们换乘油矿局的卡车继续向北进发。一路风餐露宿，加之日机的空袭，受尽了艰难。经过6个星期的行驶，终于在8月13日到达了目的地——临洮。

到那以后，他们受到了当地大力支持，送饭，送仪器，派人保卫安全，张钰哲应邀还为当地军民做了“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演讲。

9月21日上午8时40分，临洮雾散天晴。9时30分，记时员报告时间已到，全球注目的日全食初亏终于出现。10时10分，太阳被“食”约三分之一，天比阴雨天还昏暗。10时50分，光线黑暗，张钰哲他们点着烛灯继续观测。10时55分，全食开始，万籁俱寂中只听得天文望远镜和摄影机

的响声，队员们在利用短时间争取留下完整的记录。10时59分，太阳开始生光。自初亏到生光，所历时间跟张钰哲预算相同。12时19分，日全食现象全部结束，张钰哲和全体队员才松了一口气。

由于张钰哲事先的充分准备，加上各界的大力支持，这次日食观测圆满地结束了。他们观测、捕捉到的珍贵天文资料170余项，共摄照片200余张，影片20卷。归途中，张钰哲每到一个城市，就举办日食展览和演讲，向广大人民宣传日食和天文学常识。

到昆明后，张钰哲发表了题为“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首次日食观测”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在日本的狂轰滥炸下，中国首次日食观测获得成功，这不仅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振奋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精神，无数民众也因此第一次听到了“天文”这个名词。

抗战胜利后，紫金山天文台迁回南京。张钰哲也回来继续他的天文研究事业。直到1986年7月21日病逝。

张钰哲的一生是辉煌的，他为我国和世界天文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国际天文学界的高度赞扬。更值得学习的是他那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为了祖国利益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高贵品质。

能抵十万军的一枝笔

邵飘萍，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新闻记者，一生从事新闻事业，以采访新闻有独特的手段而闻名遐迩。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暴露一切黑暗和反动，最终惨死奉系军阀的屠刀之下。

1914年，邵飘萍应在沪朋友的召唤，由日本回国，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执笔，开始了他所向往的新闻事业。此后曾任《申报》驻京特派员，创办中国人自己办的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及《京报》，还受聘于北京大学、法政大学、平民大学，讲授新闻学。曾任《朝日新闻》顾问。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新俄国之研究》、《各国社会主义思潮》等书。写了很多通讯、社论等，著作十分丰富。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被卷入战争的浪潮。中国是否参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各方面都各持己见，政府也对此举棋不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讨

论，政府这才在国务会议上作出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由于是涉及战争问题，政府对此还须要保密。尽管都对这条消息感兴趣，但却没有人能得到一个准确的消息。当时任《京报》主笔、又兼任上海几家大报驻京特派员的邵飘萍也在抢这条特大新闻。尽管他以探听新闻而有名，但为了采访这条新闻，却不知碰了多少壁。

当时政府各重要机关全部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国务院大概不会客。邵飘萍坐着自己的车连国务院门都进不了，于是他便借了一辆挂有总统府牌子的汽车，一直开进了国务院大门，在内传达室下了车，掏出了“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传达长给他回禀一下。传达长很不高兴地说：“您老不要为难我吧，这些日子不但段总理绝不会客，就连他的秘书、侍从人员都不见客。”邵飘萍一听这话，灵机一动掏出一千块钱，数了五百块钱递给传达长，说：“总理见不见没有关系，只要您给回禀一声，这五百元送给您买包茶叶喝。万一要是接见了我，那我再给您五百，您看怎么样？”传达长看了看邵飘萍手中的钱心想，给他碰一碰也没什么关系，不是可以白得五百块钱吗？于是这位传达长就拿着他的名片到里面回禀去了。

邵飘萍等了不大一会儿，只见传达长笑吟吟地走

了出来，手里高举着名片，嘴里大声地说出了一个“请”字。邵飘萍见此情景，不由得喜出望外，将五百块钱塞到传达长的手里，大摇大摆地随着传达长往总理的小客厅走去。

尽管说是三天内不见客，可段祺瑞本来就想拉拢舆论界为自己多做一些吹嘘，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当他看到来客的名片上写的邵飘萍的大名时，他想，虽然邵飘萍可能是为采访关于中国是参战还是中立的新闻来的，可是会一会这个新闻界的权威人士也有必要。如果让他碰了壁，得罪了这个有影响的大记者，对自己只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邵飘萍便在他明令三天内不会客的时候，成了他的座上客。

段祺瑞知道邵飘萍此行的目的，而且知道邵記者在采访方面的特殊本领，所以，他对和战问题绝口不提。但终还是架不住邵飘萍再三再四地恳求，最后只好向邵飘萍提出条件：三天内如果北京城走漏了这项机密，要受泄露国家秘密的处分；要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还要先立好保证书。这才一五一十地将情况全部告诉了邵飘萍。即中华民国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首先调动在法兰西的十五万华工，协助协约国修筑工事等等。

邵飘萍得到了自己要采访的内容后，便辞别段